

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实践逻辑

林志友

摘要 中国人民通过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获得了追求现代化的政治资格,由此真正迈入现代化的门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不断提升和跨越现代化的历史层级,从而塑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模式。由于独特的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的现代化叙事形成话语破解,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建构、一般规律认知以及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特色等方面展示出现代化的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B27;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3-0012-08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0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P21),这为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明确了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深深沉淀在党领导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百年奋斗历程之中。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实现现代化成了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梦想,但各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又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境遇。西方国家通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式,在近代科技革命的加持下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而广大亚非拉地区至今仍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曲折前行,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反复和倒退。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则有条不紊地得以向前推进。就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而论,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独特性:一是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开显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切皆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党奉行长期稳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案。

一、历史主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长期以来那种“自我”与“他者”整体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这从本质上反映出落后的农业文明在与先进工业文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从那时起,以现代化振兴民族、强盛国家迅速成为社会共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既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和国家命运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握历史主动的生动体现。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百余年来伟大实践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获得政治资格,以改革开放奠定物质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中实现伟大跃升,呈现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历程。这里所说的实践,乃是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建立的一种深刻关联^[2]。

首先,获得现代化的政治资格——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确立以后,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被迫裹挟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造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基本格局。就落后的东方社会而言,现代化必须要通过统一的国家意志加以推行,无论是俄国的农奴制改革还是日本的明

治维新,都是通过稳定的政权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得到推进。反观中国,当“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之后,一种挽救民族存亡的焦虑心理油然而生。然而,对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泥淖的近代中国而言,由于缺乏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一根本政治前提,各种对现代化的追求都因没有政治资格而成为枉然。

为了挽救民族危局和追赶西方,近代中国无数有识之士相继提出了不同的现代化主张。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等,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移植和借鉴西方现代化方案,试图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根由,乃是缺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份来进行现代化。质言之,未能取得建设现代化的政治资格,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法跨越的门槛。正因如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屡次因外敌入侵而被迫中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带来了历史契机。自此,中国人民从向西方学习的“学徒状态”逐渐走向践行现代化的“自我主张”。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提出的形形色色的现代化方案不同,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方案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还切实地扎根于中国的具体现实,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到追求现代化必须首先要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一政治资格。然而,横亘在近代中国人民面前的“三座大山”从根本上阻遏了中国驶入现代化道路所需的社会必要条件的产生,这就意味着党必须带领人民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从根本上破除通往现代化的障碍。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宣告了中华民族被剥削被压迫历史的终结,而且标志着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更重要的是,中国获得了独立探索和追求现代化的政治资格。资格意味着准入门槛,它表明中国能够以独立的姿态自主地进行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使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确立起来。又经过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意味着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真正启程。概言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探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31](P117)。

其次,奠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只是意味着我们获得建设现代化的政治资格,从而迈进现代化的门槛。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需要政治革命作为前提,更需要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建基于贫穷落后的物质基础之上,这并不符合马克思关于更先进的制度配适更高生产力的论断。面对先进的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经济基础之间的鸿沟,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当务之急。同时,两大阵营的对立和西方国家敌视封锁的外部环境,也使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焦急心理,试图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与资本主义一较高低。

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通过全面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富足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依然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这不仅制约着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也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因而邓小平作出这样的判断:贫穷和发展太慢都不是社会主义。这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实质上也是对现代化之物质基础的追求。由此,改革开放就成为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关键一环。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强大动力有目共睹。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41](P164),而且要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1](P151)。党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坚持分阶段、有步骤的现代化进程,制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党还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决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迁。质言

之,作为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跨越,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次,实现现代化的伟大跃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果说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中国获得了追求现代化的政治资格,改革开放使中国积累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厚积薄发中实现了伟大跃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频共振之下,中国式现代化步入承上启下的历史交汇期。在这种局势下,党带领全国人民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事业实现并联式发展,让社会主义和现代化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逐步深化顶层设计,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保证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至此,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现代化建设方案呈现在世界面前。实现这一伟大战略构想无疑需要明确的主攻方向和强大的动力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6](P553),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主动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只有坚定“四个自信”破除那些诸如“老路”“邪路”等奇谈怪论,毫不动摇地坚持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走自己的路”,才能将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钥匙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迎难而上推进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在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中保持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才能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能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才能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居于首位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践已充分证明,“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7],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

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变迁都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本国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产物。中国追求现代化带来的巨大社会历史变迁,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探索现代化方向与道路的结果。由最初肩负使命挽救民族危亡,到后来立足国情铺就发展之路,再到今天全面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一种关于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清晰图景和明确方案在党的领导下逐渐成形,并转化为亿万人民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清醒的历史自觉、坚定的道路自信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引领现代化的新征程,它使中国式现代化在跨越一个个艰难险阻中不断砥砺前行,同时又始终保持中国特色和现代化底色。

可见,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推动了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获得了政治资格,真正迈入现代化的门槛,并以改革开放为举措积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跃升。这无疑与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具有深刻的关联。

二、话语破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辩驳

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西方中心”的惯性思维、“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历史终结”的天真断言、“过时失败”的主观臆想,由此生成了立足资本文明的现代化话语霸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以再造、共存、互鉴与创新成功开显出一种全新的文明叙事话语,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充满丛林法则色彩的霸权思维。纵观世界现代化文明进程,中国是迄今唯一从自身文明深处一路走来实现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以自身的实践逻辑,有力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的叙事话语。

第一,以文明再造破除“西方中心论”。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确实是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始发之地。现

代化意味着一种历史的变迁,它以现代性的进展从社会结构一直贯穿到精神生活,同时伴随一系列现代性的征候。一般而言,这些征候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会上的城市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组织上的科层化;观念上的理性化”^[8](P85),等等。以此来看,资本主义似乎就是现代性的历史具象。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社会秩序,正如费瑟斯通所言,它是“社会世界中进化式的经济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9](P4)。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均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遵循,先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成功,并凝结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一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依据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西方对“自身的发展模式就是现代化的经典蓝本”这一神话深信不疑,拒斥任何现代化的非西方生长路径,而“苏东剧变”与拉美经济转型的失败更加助长了西方的这种高傲心理。由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西方中心论”随之产生。在二元论思维主导下,西方既然是中心,那么他们势必排斥和挤压各种边缘的存在。

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既没有因西方的强势话语而俯首称臣,更没有走向全盘西化迷失自身。这是由中华文明本身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决定的,这种兼容并包的能力使中华文明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实现了自身再造。这种再造得益于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得益于中华文明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实现历史性的相遇。两者的相遇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异域获得发展的契机,也是中华文明实现自我塑造并重焕光彩的良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也意味着用中国实践去“化”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双向互动。习近平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6](P418)这无疑是对“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最生动的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回击了西方关于现代化道路的资本主义指认,展示出一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路径。譬如,在发展基础上摒弃了资本原始积累满世界掠夺的野蛮行径;在发展动力上摆脱了资本自我扩张逻辑的本性驱使;在发展保障上超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短视化功利应对;等等。时至今日,当西方现代化的神话遭受质疑时,中国的现代化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拥有数千年深厚积淀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道路上开创出一种新型的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第二,以文明共存抵御“国强必霸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是国家的全方位崛起,人类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巨大体量的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情形。对此,西方出于自身历史的经验事实炮制出“国强必霸”这一历史必然逻辑的言论,以散布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威胁”的错误臆断。西方根据自身历史演变的真实写照,坚信“国强必霸”是历史的客观规律及永恒法则,是每个强盛国家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谎称中国不可能跳出这一普世的历史逻辑,断言崛起的中国将是世界的最大威胁。然而,“资本和劳动不可调和的矛盾”本就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症结,加之资本无限繁殖的本性驱使资本主义对外扩张,而当这种扩张到达边界时,争夺霸权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必然方式。所以,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强必霸”规律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外显而已。吉登斯对此也直言不讳:“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现代性制度的核心要素。”^[10](P5)

中国以文明共存的发展理念开辟出一条强而不霸的现代化之路,使形形色色的鼓吹和谎言不攻自破,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与主观心理。纵观中国历史,行王道而不行霸道深深嵌入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基因,这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作出的独特贡献。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统治的逻辑,具有宏大的历史格局。譬如,着眼于人类利益与共同命运,在世界交往中寻求最大公约数,以“求同存异”理念来抵御“文明冲突”论调,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共存智慧来消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偏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标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实践,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与社会制度差异来谋求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体现了中国在推进文明共存中的大国担当。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追求国家富强——这是各国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

坚持以共存发展的形式对待世界文明。

第三,以文明互鉴消解“历史终结论”。西方在现代化道路上率先启程,找到使自身获得成功的两大法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这令西方对资本主义就是最完美的制度安排深信不疑,尤其是“苏东剧变”导致共产主义遭受重大挫折更加剧了他们的这种主观信念。在此情况下,福山等人信心满满,将资本主义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断言人类历史将“终结”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终结论”就是基于这种简单又武断的推定,即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以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为参照标准,在现代化道路上试图另辟蹊径的作法只能归于失败;进言之,西方尤其是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顶峰,意味着历史发展的最高形态。就其本质而言,这种对资本主义“胜利”欢呼雀跃的背后,是对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极端无视,也是对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选择性遗忘。

“历史终结论”本身既未经受住历史的检验,还面临着现实的摧毁。那些奉行自由市场和西式民主的国家,并未如愿获得现代化的成功,反而将自身拖入苦难的深渊,如巴西、阿根廷等一些拉美国家对现代化所作的“贡献”,就是源源不断地提供西方现代化的诸多反面教材。可以说,当今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历史终结论”这一论调得到了充分证伪。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中坚守和巩固社会主义,并且将这一制度的显著优势发挥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开辟,不仅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比寻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照搬西方打造的“普世模式”更为紧要,而且还有力证明了“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6](P367),更展示了现代化转型的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思路与实践依据。

第四,以文明创新回击“过时失败论”。马克思主义作为经得住检验的科学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在资本主义长期持存和社会主义曲折前进的背景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失灵论”“过时论”“无用论”甚嚣尘上,不断质疑马克思主义在指引人类社会进步方面的科学性。不少人宣称,当今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逐渐成为过往,马克思主义这一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已经成为“过去式”。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已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逐渐退潮而显得陈旧黯淡。这些炒作要么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不明真相的一知半解,要么是对其进行别有用心之心的肆意歪曲。对此,阿兰·巴迪欧的见地可谓切中肯綮:如果我们抱以严谨的态度,就不会草率地“宣布什么东西‘终结了’,完成了,或陷于彻底的死局”^[11](P8)。事实上,只要客观审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情就不难发现,所谓的“过时失败论”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无稽之谈。

一个文明能否创新,关键看它能否实现自我升级,以解决其他文明无法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相遇,实现了科学真理与伟大文明间的彼此塑造、相互成就,不仅使中华文明本身的强大精神力量得以充分激活和迸发,也使马克思主义以不断创新之势在当今世界越发熠熠生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催生了一脉相承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强大的真理力量,在指导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自身的新面目。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具有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气质,它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升级。这无论对中华文明还是对马克思主义而言,都以守正创新的姿态永葆青春活力。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破除所谓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束缚,创制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以及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12]。中国式现代化以自己独特的实践路径,使西方关于现代化的各种叙事话语与荒谬论调都不攻自破。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互动,开创了前无古人的现代化事业。

三、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升华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就是追求现代化。由于人类的现代化之路最先被西方开辟出来，西方似乎拥有现代化理论的专属解释权。他们极力张扬现代化的价值表达和基本框架，探讨现代化的重大议题及发展困境，并主导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和理论话语。时至今日，尽管现代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但发展中国家关于现代化的相关论说始终被排斥在西方主流话语之外。“现代化=西方化”一度成为西方国家不可置疑的信条，甚至被不少发展中国家作为参照的首选蓝本。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的自主探索面临危机自会助长西方的“师爷”心理，更加固化其居高临下一家独霸的姿态。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本质及规律作出的科学理解，不仅是中国独立自主探索民族发展道路的概括凝结，还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开辟的重要体现。更重要的是，它使“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不攻自破，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练成型和持续发展，不仅打破了西方关于现代化的话语垄断局面，还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理论藩篱，以中国的实践推动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现代化理论源于现代化的实践，独特的实践催生理论的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拓宽了现代化的多元路径，丰富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多重选择。在人类关于现代化的诸多探索中，中国以富有民族特色的实践展示出现代化的另一番图景。

其一，恪守自信自立精神，形成异质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建构。作为一项未竟之事业，现代化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西方曾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进行理论探索，凝聚出关于现代化的西方言说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虽然西方的种种现代化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理论观点上各有不同，但皆不约而同地遵循这样一种先验逻辑：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为不证自明的理想框架，自然得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片面结论。当然，西方内部对此也存在不同声音，遗憾的是，由于非西方世界缺乏成功的现代化案例，致使西方的内部质疑和批判在说服力上大打折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自信自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在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前提保证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内涵得以充分展现，它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政治规定，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明确概括，实则指明了现代化在中国具有的独特表达。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特征都没有被纳入西方现代化的行进轨道，而是被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新的发展内涵。不仅如此，“两步走”的科学描绘，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具体实践的宏伟蓝图——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如习近平一再重申的那样：“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3](P484)

其二，超越西方叙事，深化认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的普遍规律，它既遵循唯物史观揭示的发展定向，又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呈现出特殊的运动方式。现代化的发展亦是如此，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进程，展现出从物质到精神乃至社会结构的自我提升。诚然，西方经由工业革命率先步入现代社会，对现代化作出诸多重要建树。尽管西方主要依仗资本和自由获得了现代化的成功，也可谓是现代化探索的先驱，在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功不可没，但也恰恰是这种先驱身份赋予西方强大的道路自信，迷信市场经济加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就是实现现代化的不二法门。殊不知，西方现代化存在着诸多隐忧，如“意义的丧失”“目的的晦暗”及“自由的丧失”^[14](P12)，等等。在现代化的西方叙事之外，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关于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也随之加深。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回答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发展战略，其中不少方面涉及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无论是曾被西方现代化理论忽视的方面，抑或是西方现代

化无力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得到了科学解答。可以说,席卷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洪流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独特诠释。当然,尽管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源自特殊的中国实践,较之于西方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但它遵循现代化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呈现出内在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或是共通性,对正在摸索现代化之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方案。

其三,铸就中国特色,开拓现代化的新型之路。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15](P3)反观中国式现代化的行进之路,已经形成了“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1](P22)。现代化代表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跃迁,它呼唤社会在整体上发生建制性的转型:经济上,以市场化推动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转轨,以工业化为主导实现各领域的现代化;政治上,以民主化取代封建专制,以法治化实现依法治国;文化上,以理性化开启科学启蒙,以世俗化击败神权统治。这些历史性转变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合奏,而中国在这一合奏中已自成一曲。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物质财富巨大增量的同时,阻止了资本的野蛮生长;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民主政治的“广泛、真实、管用”;通过“两个结合”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点,在现代化进程中紧紧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魂脉”与“根脉”。中国的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之中,既遵循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又结合自身的特殊国情,铸就了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显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深扎根中国大地,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具有深化之功,而且还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贡献嘉惠后世的示范效应。

其四,秉持胸怀天下,开创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不同于西方将自身文明推至神坛鼓吹“西方中心论”,也不同于亨廷顿夸大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始终保持一种兼容并包、交流互鉴的姿态,以开放的胸怀对待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继承和发扬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着力构建多姿多彩的世界文明形态,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就现代化的议题而言,中国致力于推动“五大文明”协同发展,描绘出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并联式发展的路线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开创出一种全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深受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同时瞄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定向,展现出唯物史观的时代诠释力量;它对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兼收并蓄,始终朝向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因而能在自我创新中行稳致远。由特殊实践孕育而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人们头脑中的长期禁锢,让世界看到现代化在西方之外依然存在别样的发展路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6](P407)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生态观等,作为对现代化之多样性的全面表达,为现代化理论注入了更加丰富的思想内容,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展示了文明新形态应有的内在规定。

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不仅意味着开掘出一条异质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片面追求物质增长的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呈现出累积式提升、跨越式赶超的现代化发展态势,以全面协调发展扭转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片面逻辑。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彻底打破了西方依靠武力和掠夺实现并维系现代化的辐射效应,革除了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现代文明面临的系统性危机。进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两个文明”为历史起点,以“五位一体”为现实终点,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愧于时代的巨大魅力。

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依靠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11](P16)。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伟大创造,是对世界现

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它正在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变革和重大贡献。伴随着世界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必将迸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 吴晓明. 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6).
- [3]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4]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5] 江泽民文选: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6]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7]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日报, 2023-02-08.
- [8] 童星. 现代性的图景: 多维视野与多重透视.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9]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刘精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10]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夏璐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11] 阿兰·巴迪欧. 哲学宣言. 蓝江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2] 任平. 论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 (5).
- [13]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4] 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 程炼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15]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The Uniqu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in Zhiyou (Hen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nn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pursu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 engage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utting across the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and embarking 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ue to its unique practical pathway, Chinese modernizat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Western narratives for modernization, has achieved a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s. Meanwhile, Chinese modernization demonstrates a new path of modernization and 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in terms of the basic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general law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
- 作者简介 林志友,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河南 开封 475001。
 - 责任编辑 涂文迁